

 中南民族大学
重点学科建设丛书

CHUANCHENG YU CHONGJIAN

传承与重建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现代化史论集

主 编 许宪隆
副主编 方清云 沈再新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中南民族大学
重点学科建设丛书

CHUANCHENG YU CHONGJIAN

传承与重建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现代化史论集

主 编 许宪隆
副主编 方清云 沈再新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承与重建——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现代化史论集/许宪隆主编.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6

ISBN 978 - 7 - 216 - 05293 - 1

I. 传…

II. 许…

III. 史学理论—文集

IV. K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40522 号

传承与重建

——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现代化史论集

许宪隆 主编

出版发行: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武汉科利德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7.375

字数:450 千字

插页:2

版次:2007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200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 - 7 - 216 - 05293 - 1

定价:45.00 元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目 录

导 论

转型期的传承与重建	许宪隆(3)
-----------------	--------

甲编 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近十年来中国现代化史问题研究述要	闫永增(29)
近十年来中国早期现代化思想研究综述·····	刘 虹 俞祖华(40)
近代中国百年现代化历程及其历史启示	姚 琦(56)
中国现代化道路:百年历史的回顾与展望	陈 剑(68)
试论民族地区现代化的起点、分期和特点	吴建国(82)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早期现代化思想研究	唐爱芳 杨晓慧(96)

乙编 近代少数民族地区社会转型

对军阀体制下甘宁青早期现代化进程的再审视 ···	许宪隆(103)
清末“新政”时期广西当局的实业政策与措施	戴宏军 蒋勇军(130)
清末新政与边疆地区的现代化进程 ——以广西为例	钟 霞(137)

论清末新疆“新政”

——新疆向近代化迈进的重要开端 齐清顺(146)

新疆哈萨克族近代文化转型进程述论

..... 夏里甫罕·阿布达里(159)

民商与近代广西少数民族农家经济的变迁

..... 陈 炜 赵 健(175)

清末川边改革新探..... 赵云田(194)

丙编 政局变动中的民族地区的民主化取向

论辛亥革命前后西北诸马军阀的角色转换

..... 许宪隆 韦 甜(219)

论近代新疆军队发展的历史进程 齐清顺(235)

近代西北回族反清运动中的政权问题 霍维沁(248)

试论西康建省与康区的早期现代化 吴建国(260)

民国时期维吾尔族聚居区的乡村政权 黄建华(272)

丁编 晚清以来民族地区的工商业道路

广西工业近代化内力因素初探 甘硕业(283)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资本主义工业 况浩林(292)

近代云南的矿业工业化与社会扩散效应 陈征平(304)

民国时期回族民族工业剖析 答振益(321)

近代新疆铁路规划述论 黄达远(332)

滇西民族商业资本的转化与近代云南社会 杨煜达(342)

新疆货币金融的近代化 吴福环 宋佩玉(354)

试析近代广西回族工商业发展状况及其特征 李 云(3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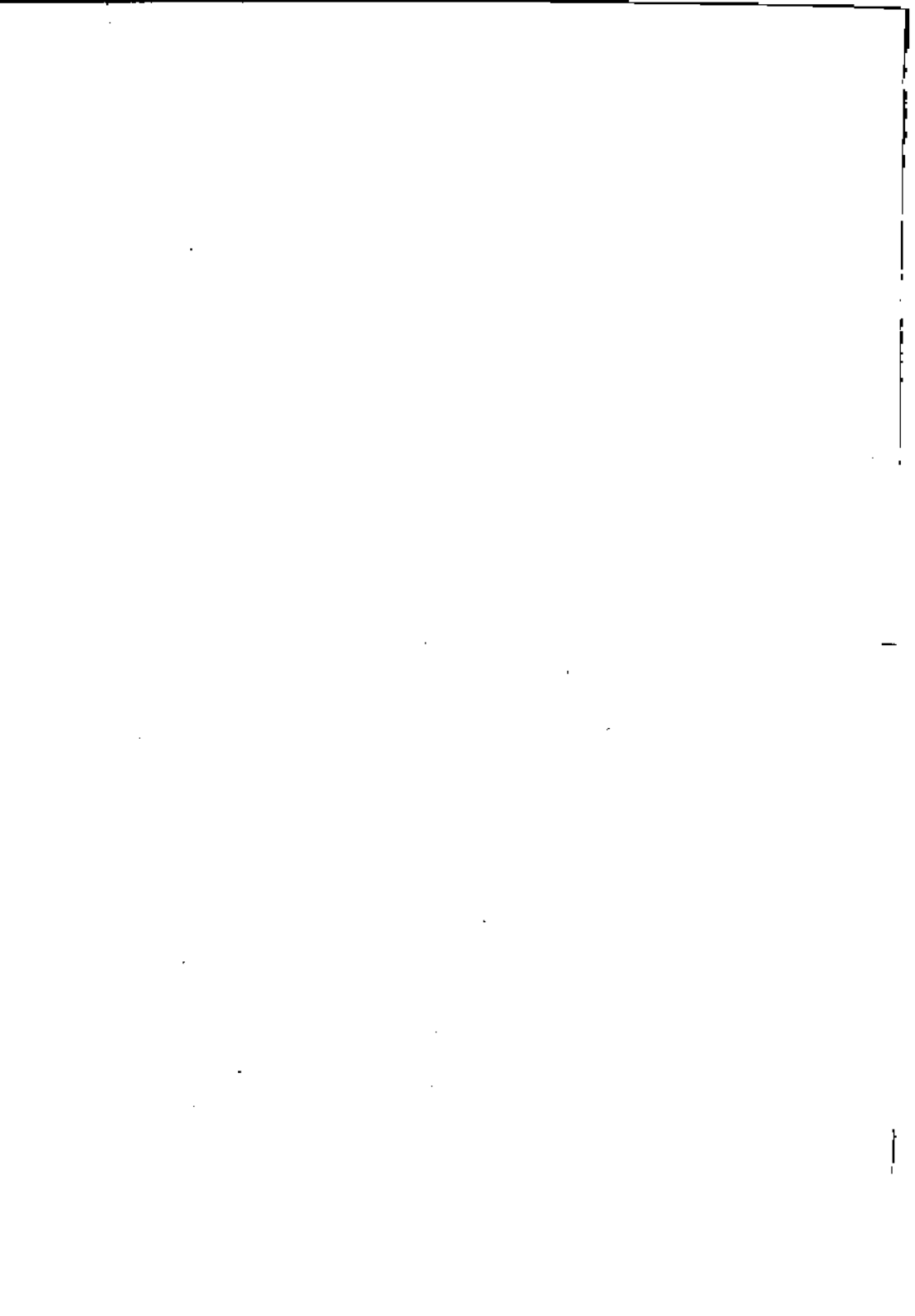
戊编 西学东渐与少数民族文化演进

左宗棠发展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思想和实践	付宏渊 (381)
孙中山的民族思想与民族地区的现代化··· 李资源	张 英 (389)
近代回族文化运动主流思想论	哈正利 (402)
试论回族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理论与实践···	许宪隆 (413)
论近代云南景颇族的文化认同	陆 云 (424)
论清末民初贵州现代知识分子阶层的崛起及对贵州 社会分层的影响	王继红 (434)
清末民初贵州现代商人阶层的兴起与贵州的早期 现代化	陈昌茂 (446)
抗战时期的西北开发与民众意识的近代化	李建国 (453)
论抗战时期高校内迁对西南地区观念近代化的影响	张成浩 莫宏伟 (461)
清末民初鄂温克族新式教育初探	麻秀荣 那晓波 (473)

己编 典型个案

近代时期西南地区近代化问题的历史考察	谢本书 (491)
蔡锷与云南现代化	邓亦武 (500)
张鸣岐与清末广西近代化	钟 霞 (510)
云南经济近代化进程中地方财团的实业投资分析···	肖 艳 (527)
中国的近代化与国情	刘云波 (538)
后 记	(551)

导 论



转型期的传承与重建

许宪隆

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是一个民族发展阶段的标志。完善的社会组织形式既是民族地区社会前期发展的良好回报,更为其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开辟了坦途。从这个角度来说,社会转型实际上是社会组织形式的自我完善,或者是在外部作用力的冲击下完成的社会架构重组。历史上对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两次社会转型,一次是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型,至迟到宋元交替之际,除个别例外或出现社会倒退现象外基本完成;一次是从传统农耕社会或游牧社会向近代社会的变革,过程展开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期的百余年间。两次社会转型的共同点在于:社会转型的纵向时间均略晚于主体民族,且得益于主体民族——汉族的带动;社会转型的方式都是在非本民族文化的冲击下进行的自上而下的社会自我整合。这两个特点决定了居于少数民族社会上层的特权集团,在划时代的社会变革过程中具有无法替代的诱导作用,而以汉族文化为标本的传统习惯,在很大程度上注定了少数民族社会发展长期落后于主体民族的命运。

近代民族地区社会转型,即民族地区的近代化,学术界一般又称之为“早期现代化”,或简称“现代化”,特指中国自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前这一时期的资本主义化。按照早期现代化的基本理论,它应包括三个方面的核心内容:一是学习西方近代科技的资本主义工业化;二是推翻封建专制的资产阶级民主化;三是

反帝爱国的民族化运动。一个国家或民族要实现现代化,一般要经历从准备到全面启动,再到最终完成三个循序渐进的阶段。由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区文明发展进程的不平衡和不一致,现代化的实现又可以分为“早发内生型”及“晚发外生型”两种模式。

根据学者们的研究,近代中国的现代化属于“晚发外生型”,正如章开沅先生所说的那样:“离异的驱动力则首先而且主要来自社会外部。当一种落后文明与先进文明相遭遇的时候,落后文明或则因被先进文明同化而趋于湮灭,或则由于外来文明的强大吸引力,在自身内部萌生逐渐增强的离异倾向,加快了新的‘子体文明’的诞生速度。”而且早期现代化在我国只经历了准备和启动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40年至1911年辛亥革命,是早期现代化的基础——资本主义思想和生产方式的确立时期,也是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准备阶段;第二阶段从1911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是中国开始向现代化过渡,工农业技术(主要是工业)加速发展,带有封建性质的近代大资产阶级或民族资产阶级登上历史政治舞台的时期,社会转型在部分地区和部分民族中已经正式启动。1949年后,早期现代化的进程由于政权的更替而中断,逐渐走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我国少数民族社会发展历来以汉族马首是瞻,所以在汉族社会转型和西方文化双重作用下引发的民族地区早期现代化,在发生方式和发展进程上均与汉族基本同步,但由于民族地区与广大汉族地区,不同民族地区之间在社会结构、地理环境、生产方式和水平,以及宗教观念等思想文化方面的差异,使得这一文明进程在不同民族间更具独特发展的魅力。

近代民族地区的社会转型,涉及到两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少数民族上层集团作为一个相对松散的社会利益群体,对民族地区社会转型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二是民族地区早期现代化晚发外生的模式,实际上在20世纪上半叶的50年间,更加拉开了少

数民族与汉族的发展差距。对这两个问题,尽管既往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明显地还存在着不尽如人意之处。

对近代少数民族特权阶层的研究以个案居多,内容集中在人物的生平事迹、人物对时代和社会的贡献、人物思想及著作分析四个方面,所不足的是没有把他们置于所属的本民族社会群体之中;更没有把各民族上层人物作为社会利缘群体对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发挥的变力恰如其分地表述出来;很少有研究论著把他们个人的行为与社会转型的大气候及早期现代化的潮流切合在一起,不是过高估计了个人的时代觉悟,就是过分渲染了西方文化的影响。

对近代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政治与文化变迁的研究,学术界达成了“处于政治动荡与文化变革之中”的共识。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少数民族大都分布在边疆地区,在西方资本主义入侵过程中首当其冲,是东西方文化交锋的前沿阵地;近代与列强签订的各种不平等条约中开辟的通商口岸,相当一部分位于民族地区;外国传教士的传教活动,一开始便避实就虚,深入到穷乡僻壤的民族地区,使“洋教”和西学在那里埋下了最初的种子。所有这些因素,都对少数民族地区根深蒂固的传统社会产生了较大的冲击力,动摇了传统社会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政治上封建宗法势力被逐步削弱,民众反封建的民主斗争不断加强;经济上上层人物创办了一大批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实体,改变了传统的经济运作方式;文化上由于教会势力的膨胀及教会学校的广泛设立,相当多的少数民族成员通过加入教会,或在教会学校中读书认字而接受了洋教和西方近代文化,民族地区一向稳定的社会结构进入了不稳定状态。近代西方文化以各种方式大面积地迅速传播,导致民族地区社会性质和社会矛盾发生了新的变化,成为近代民族地区不间断地爆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根本动因。而对所有这些新变化,还缺乏学者从早期现代化和社会转型的学术角度,加以高度地概括和深入地探讨。

由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组成的特权阶层，是历史和时代的产物，他们从少数民族普通成员跻身为社会上层分子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少数民族社会特权阶层的形成过程。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边缘群体，其初始特权的获得大致有四条途径：一是民族战争或部落战争的英雄；二是在特殊时期对本民族生存和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人物，或者说生计的首领；三是少数民族社会中形形色色的宗教对凡人的神化；四是因各种原因得到本民族统治者或中央王朝册封的新兴贵族。特权阶层一旦形成，出于利益的需要，往往派生出涉及本民族社会各个层面的衍生特权，从而使一部分人拥有左右一个民族当前命运和未来发展方向的绝对权威，大部分其他成员则处于被支配地位。

少数民族特权阶层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游移于对于国家和本民族“责—权—义—利”的循环圈中——对本民族的统治政策徘徊于“仁治”和“人治”之间；经济活动显然有着“义—利”之间的取舍；重大决策必须克服促进民族发展与维护群体权威的矛盾；外敌入侵时则要再三考量民族大义与集团利益。中国历代民族关系中出现的和、战、贡、市的主流走向在很大程度和很多时候主要出自该群体所作决策的结果，或者说是该群体集团意志的产物。

鸦片战争敲响了中国社会早期现代化的开场锣，同时也拉开了少数民族社会早期现代化的序幕。由于深厚的爱国主义文化积淀，少数民族上层人物在这场划时代社会变革中积极活动，对民族地区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起到了不可或缺的引导作用，这些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政治上由对西方文明的最初愤慨发展为社会改良思潮，继而投入变法维新运动，直至辛亥喋血，并在“五族共和”的旗帜下参加护国战争、护法运动和国民革命，成为追求“共和民主”理想的一股重要社会变力，在稍后的抗日救亡

道路上更是“振兴中华”的擎旗者；经济上掀起了创办民族实业的热潮，涌现了一批近代中国可圈可点的民族经济实体，尽管这些资本主义企业大多数旋起旋灭，但实业热潮对民族地区传统社会的冲击，对近代思想文化在民族地区的传播及民族地区自然和人文资源的开发，无疑起到了身体力行的示范作用；文化、教育方面，受新风大化的时代影响，他们不再盲目迷恋原封建文化，一方面在新文化运动中开始借鉴和吸收西方先进思想文化，设立新式学堂，创办报纸杂志，普及科学知识，另一方面也重新审视本民族的传统，将其精髓与新文化相糅和，形成具有崭新生命力的民族文化，近代以后少数民族没有再出现历史上多次发生的整体融合进汉族的情况，最主要原因就在于这场传统文化的民族性自强运动。

贯穿民族地区近代社会转型的思想主线是少数民族上层集团对待西方文化从愤排到理解，从相容到吸收的态度转变，对近代先进的资本主义文化的肯定，事实上也就是对传统社会封建文化的否定，而接受资本主义文化，便意味着为传统社会产物之一的特权阶层的衰亡，培养和造就了自己的掘墓人。

近代百年是少数民族特权阶层走上“神坛”以来，因时创造的最大和最后的辉煌，历史上向心运动积淀下来的中华情结成为转型期爱国主义的动因，所以近代少数民族反帝反封建斗争极为活跃。转型过程中特权阶层维护本民族的生存与保护本阶层利益休戚相关，民族本位主义动机与推动社会转型并行不悖，故而始终是社会转型的领导集团。宗教作为民族精神和凝聚力的载体，是贯穿特权阶层所有行为的只升不降的旗帜，在社会转型全过程中始终高高飘扬。资本主义社会体制的特征之一是经济地位决定政治地位，所以说特权阶层创办近代企业是义利并举的经济行为。少数民族上层集团因时权变的最大社会效应是使民族地区传统社会架构不同程度地得到改造，社会全面转型已迫在眉睫。

一些现代化论者流露出对中国早期现代化未能在大陆经历最终完成阶段而惋惜，颇有功亏一篑的感触，其实，中国的早期现代

化早在准备和启动阶段,就已经逐渐暴露出一个致命的弱点:即封建文化中的腐朽因素与资本主义文化中反动因素的一拍即合,而且日久弥坚,这就注定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绝不可能使中国像日本等“次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那样,迈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它的前途只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华民国”的沉沦与覆灭,已经无可争辩地证实了这一点。20世纪中期中国大陆新旧政权的更替,使广大民族地区和中原地区一样,结束了已经误入歧途的早期现代化进程,这对绝大多数生活在社会中下层的各族人民群众来说,都是毋庸置疑的一大幸事。而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最大成果,莫过于为20世纪后期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提供一个稍强一些的基础和更高一些的起点罢了。

二

少数民族地区的早期现代化的进程与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少数民族精英集团近代以来政治思想与社会观念的变化发展,即由社会改良思潮向变法维新思想的递进,再到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不懈追求过程;第二,少数民族上层人物自洋务运动以后,逐渐形成了“实业救国”的思想体系,并且因此创办了一批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民族实业;第三,少数民族平民社会对待西方文化,从愤排到相容、从不屑到崇拜再到务实的吸收,这种文化价值观念的悄然转变,是对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基本肯定,同时也是对传统封建文化的基本否定。而在社会不同层面接受和推广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文明方式,便意味着已经为各民族传统社会的衰亡,培养和造就了自己的掘墓人。

就近代少数民族精英集团的政策制定动机而言,主观上虽然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为“利”所动,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特殊社会地位和特殊权利的优势,维系集体权威,保护集团利益,巩固本阶层统治。但御侮图强的爱国主义“大义”已经毫不含糊地上升到

了第一位,而且有时为了这个民族大义,不惜牺牲个人或集团利益,实行部分特权的让渡。

例如清末云南干崖年轻的傣族爱国土司刀安仁,19世纪后期多次率领当地傣族、汉族、景颇族、傈僳族和阿昌族民众,自发组织起来抵抗外国侵略者的武力入侵。后来,他怀着强烈的救国志向,西游印度,东渡日本,考察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多次与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会晤,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成为同盟会的早期会员。1907年,他在孙中山的安排下回国,在干崖自己的辖区内建立了同盟会支部,土司衙门成了革命党人活动的据点。除了进行民主革命活动外,他还从日本等国引进资本和技术,聘请技术人员,按照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创办火柴厂、纺织工厂、橡胶园等实业;又制定新城建设规划,着手改造当地由来已久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其主要意图显然是彻底废除封建的土司制度,这表明他已经自觉地转变为民族地区上层统治集团的“叛逆”。1909年,他献出祖传的部分家产购买枪枝弹药,准备“将以一隅号召人心为天下倡”,组织“敢死队”发动干崖起义。武昌首义爆发后,他又资助和亲自领导了著名的腾越起义,成立云南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权——滇西军都督府,任第二都督;他不久就被蔡锷等错误地削去职务,继而被袁世凯逮捕入狱,平反后也只是一个陆军部咨议的虚衔,41岁便英年早逝。他在辛亥革命后无论实权、地位,还是社会影响力,都比不上从前作干崖土司,但他放弃特权,至死不懈地追求资产阶级民主,可谓是舍小利而顾大义。

就近代少数民族地区各项新政策实施的过程而言,打破了民族地区社会等级制度的森严壁垒,在引进和吸收近代资产阶级文化的同时,尽量实行资本主义管理体制要求的用人制度,使一些处于社会下层、精于管理的本民族成员,有机会突破等级限制,由经济实力的上升而提升社会地位,反映了民族地区传统等级社会的松动和普通社会成员对上层人物人身依附程度的降低。这种完全不同于以往所有生产关系的新形式的出现,社会科层流动的加快

以及生产关系中新因素的不断增长,也是少数民族地区社会转型的标志之一。

就近代民族地区推行新政策的实施结果而言,政治上打破了狭隘民族主义的界限,御侮图强、共和民主的观念深入人心,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爱国主义主旋律,成为各民族自觉投入反帝反封建运动的时代最强音。近代少数民族反帝反封建斗争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在中华民族面临存亡危机的每一个重要关头,各民族不论大小、地域,都会不约而同地以各种方式联合起来共同对敌。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从来还没有像近代那样无视民族畛域地同仇敌忾过,这与不同时代各个少数民族对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理解高度和境界有很大的关系。

经济上开办了一大批资本主义性质的工矿企业,一方面使民族地区自然资源的开发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水平,另一方面也为民族地区未来经济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物质、技术基础。民族地区的经济不再是简单的、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封建生产方式的重复。农业产品、工业产品的商品化,商业资本的迅猛发展、外国资本的渗透,表明民族地区已经加入了发展中的中国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并且间接地同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发生了联系,民族经济的内向型特征正在消退,外向型的特点日益增强。

文化态度转变的效果更加直观、明显。历史上少数民族各阶层人士一向崇尚中原文化,把以汉族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当作是自己赶超的目标,长期以来形成了以汉族文化马首是瞻的文化取舍标准,因而在少数民族地区产生这样一种文化导向:凡是中原地区的文化,都是优秀和先进的文化,也是各民族吸收和学习的楷模。这个导向的正面意义在于从文化上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维护了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在相对稳定状态下的历史延续。但它同时也存在着一个不容忽视的负面结果,即各民族文化发展上的“马太效应”——少数民族往往忽略了本民族文化或多或少的优势,一味地崇信、甚至是崇拜中原地区的封建文化,以至于陷入了民族文

化虚无主义的误区,结果造成两个直接的后果:要么是在民族文化的失落中整个族体沉没于汉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即我们常说的民族同化和民族融合;要么是不分精华糟粕,亦步亦趋地紧随汉文化,结果永远赶不上前者,更不用说超过了。一部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大体都跳不出这个文化轨迹,这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化整体上落后于汉族的主要历史原因。

近代中国封建王朝在遭遇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挑战面前,充分暴露了其政治上的腐朽和文化上的作茧自缚,屡战屡败的事实促使各民族(包括汉族)有识之士进行文化比较和反省。大国败于小国,封建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的优劣不辩自明。同一起点的邻邦小国日本的迅速崛起,更坚定了各民族学习先进文化的信心和决心。中外社会短时间发生的巨变使各民族人民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一个民族要在优胜劣败的自然法则中顽强地生存下去,必须构筑一种开放性的文化——既敢于大胆吸收先进文化,取长补短,又要不断发掘本民族文化的精髓,塑造本民族文化的灵魂。少数民族文化传承者沿着这个思路,对中国传统文化、本民族本地区文化传统、西方外来文化都加以鉴别扬弃,通过新文化运动重新建设本民族文化,终于形成了今天我国各民族多姿多彩的文化特色。这种客观、实事求是的文化观,比起他们的前人,不知要高明多少倍!而少数民族为了悟出这个道理,又付出了多么沉重的历史代价啊!直到今天,各民族人民还得为消灭民族间发展上的差距不断地努力。由此更加反证出近代少数民族文化观的调整,对于未来中国各民族的发展,是多么重要而又富有意义的一个步骤。

三

少数民族历史上千百年来传承下来的中华情结,在近代中西文化的调适过程中表现最为突出和明显。从1840至1949年的少数民族的近代文化活动,按照他们对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